◆观　点

大国崛起有规律可循

中国正在崛起，日益引人关注。历史上努力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有的则功败垂成。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是内外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大国崛起是有规律可循的。

第一，地缘环境是大国崛起的基础要素，崛起国一般都具有某些先天的自然优势。拿破仑说过，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就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政策。中国始终面临作为陆海复合国家所遭遇的制约性问题。根据地缘政治规律，双重易受损性以及国家资源分配分散化构成了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政治弱点，决定了他们必须努力在海陆两方面保持一定的平衡，而克服这一弱点，需要极高的外交技巧和谋略。

第二，国家定位准确将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战后，法国实际上已沦为二流国家，它通过文化强国的国家定位，实现并支撑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此外，在崛起的空间选择上，成功崛起的大国往往将影响力的展示重点选择在有利可图，且大国博弈层级相对较弱的地区。

第三，挑战现存体系是极危险的，要处理好同霸权国的关系。对崛起大国而言，制造危机比危机管理更需要智慧，适度紧张有利于崛起大国。当然，新兴大国的崛起必须避免与当时的霸权国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乔治·莫德尔斯基总结出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近500年来，霸权的直接“挑战者”大多都遭到了失败。

第四，崛起的时间相对漫长，考验战略定力。崛起大国要耐得住寂寞。崛起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统一，保持领土完整，在政治上拥有独立的合法性主权，在文化上建构统一的民族认同，有行之有效且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推行正确的内外政策，能够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需要与同期的其他大国进行博弈。因此，崛起过程相对漫长。战略定力，即要求看长远、顾大局，能够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和冲动，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顺利与挫折。

第五，国家崛起的基础是综合国力的发展与强盛。国家崛起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强国地位，但是强国地位并不等同于霸权，而是一种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世界中心不仅具有世界级的物质力量，还具有世界级的文化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就历史规律而言，软实力是成功崛起的途径，也常常成为制约崛起的瓶颈。

第六，国家崛起一定要在制度层面塑造世界。对西方世界而言，资本不仅要寻求红利，还要创造话语。今天的美国就通过薯片、芯片、影片等“必需品”，在无形之中塑造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力图将人们对美国文化的好奇上升为对美国社会的欣赏与认同。

依据大国崛起的规律，中国崛起不仅应该是个经济事件，更应该是个文化事件。中国人有进行全球价值贡献的资本和需求。2012年赴以色列访问时，一位近80岁的以色列著名学者对我讲，他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中华民族，另一个是犹太人，因为中华民族影响了整个东方，而犹太人影响了整个西方（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源头是犹太教）。但他同时强调，这种影响更多是过去时，中国要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中国的影响范围由东方扩大到整个世界，影响的时间坐标由传统帝国延展到现实中国，影响内容由文化吸引扩大到价值感召。

今天，中国实力的提升已经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格局变迁的重要变量。在国际舞台，“走出去”的是中国企业、中国留学生、中国游客、中国产品等，但“走进去”的应该是中国文化、中国信仰、中国价值与中国追求。读史使人明智，让历史照亮中国未来的行程。（2014年10月17日《环球时报》赵磊）

以市场逻辑化解地方债之忧

今明两年，地方债务将迎来偿还高峰期，此前地方政府性债务近四成是依靠卖地来偿还，而土地出让收入极易受出让土地数量、宏观政策调控、货币供应量等因素影响，一旦地方债务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最终负担都将由纳税人买单，进而严重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更为关键的是，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随着城镇化步伐加速各种刚性支持增加的背景下，未来地方政府偿债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恰因此，地方性政府债务的“堰塞湖”风险亟待得到正视，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起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事实上，地方政府是代表当地公民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机构，为了提高服务效率与品质适度举债的现象在海外颇为常见，并以市政债、政府专项基金、专业银行贷款等多种形式存在。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是通过加强预算硬约束、严格债务规模控制、提高债务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体系等方式对地方性负债进行管制。显然，此次国务院提出“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等主张，颇有借鉴海外经验的意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华盛顿州的供水系统收益债券出现违约，当地政府就没有救助债券持有人；而1995年加州第二大县橙县无力偿债时，州政府也拒绝救助。实践表明，这一原则将会倒逼地方政府在发债时秉持审慎态度，彰显“谁举债谁负责”的市场化准则。值得一提的是，决策层此番在对地方性债务进行整治的过程中，正是以市场化逻辑对举债主体、举债程序和责任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厘清，进而推动了地方债的阳光化管理，对约束地方新增债务、管理存量债务颇有裨益。

其实，化解地方性债务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追根溯源，导致地方债规模庞大的主要症结在于，当前财税体制强调了中央对财权的上收，而事权却持续下放，以至于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矛盾积重难返，不得不通过举债和表外的土地财政缓解资金周转困境。再加上地方负债的隐性化在客观上纵容了违规圈钱、大规模上马形象工程等乱象，导致了地方债难以控制。为此，决策层已经从制度层面着手疏导地方债顽疾。今年8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预算法的决定，明确规定有限放开地方发债权，并将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为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扫清了法律障碍。当然，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展开，通过加快税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关系，逐步实现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互匹配，从源头上引导地方政府以战略眼光合理安排举债与偿债事宜，为防控地方债务风险滋长建立长效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未来将作为发债主体直面市场，必然对配套政策环境提出新的要求。从当前10省区市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的试点运作情况看，各地发行的债券利率普遍与国债持平甚至略低，这种利率“倒挂”现象有悖于正常的市场逻辑，其背后则是地方政府与金融市场边界不清等问题的暴露。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根据财政部规定发行债券前要开展信用评级，而这些“自发自还”试点均获得了“AAA”级的最高信用等级。如此一致的高级别信用评价究竟是表明这些地方政府债券资信程度的确都非常值得信赖，还是反映出当下评级环节较为薄弱，尚难以全面彰显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理念？此外，有关制度还应当对地方性债务的披露范围、公布方式、民意汲取等做出更加详细的规制，以切实提高广大债权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强化外部约束机制。（2014年10月15日《南方都市报》马红漫）

◆文　坛

古竹简的新启迪

央视10月13日播出新纪录片《简，不简单》，其中耐人寻味的，是考古心得。文物竹简保存时间长短，取决于其存在环境（古墓）中水分的多少：“干百年，湿万年，不干不湿仅半年。”这让人奇怪，怎么全部泡在水里的竹简最长寿？怎么“不干不湿”的状态最损害竹简寿命？

同日有则小新闻，似可引人进入解惑大厅。《南方都市报》披露，21世纪新闻报道：红牛在美国因一句广告语输掉了官司，赔偿美国消费者1300万元美金。那惹祸“金句”是：“红牛，给你一双翅膀！”美国人起诉：这是欺诈广告——我喝了红牛许多，至今没有长出翅膀。

红牛粉丝反驳：这真是冤案！要在中国，绝不会有如此不懂修辞手法的讼棍。中国有多少类似广告安然无恙啊。也有人庆幸，红牛“蚀小财免大灾”：幸亏这广告不真实，如若真让美国人长出翅膀——让人变为怪胎人，赔偿一定多到天文数字。

大笑之余，突然想到，“红牛广告金句之冤”，奥妙可能就在于“不干不湿原理”：美国人若对汉文化全无兴趣，不会理睬红牛；若是“中国通”，则不会不懂中式浪漫与美式浪漫有天壤之别，天真地期待红牛真让人长翅。

“红牛金句”本是一枚产自中国特色的文化“竹简”，近年美国虽因一些孔子学院传播了些许汉文化，却还只处于“不干不湿”状态。所以“红牛竹简”在美国只能遭遇“不干不湿仅半年”的悲剧。而在中国，红牛无论怎样狂呼“给你一双翅膀”，也绝不会有任何危险。华夏遍地都是适合“红牛金句”的浪漫之水。曾几何时，全国百姓都被“大跃进金句”轰得耳朵起茧：“‘三面红旗’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结果呢，人民公社在改革开放时被撤销。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类似“人民公社是金桥”的“金句”，从未消失过，甚至于今为烈。时下还有地方满大街拉横幅：“强拆，还你一个国际大都市！”“政府强拆，百姓幸福！”……

京城近期响起“三牢记”木铎：“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这让人想到，“大跃进广告金句”不断重演的历史教训也须高度重视。如可借鉴红牛因一句浪漫广告语赔款的经验，当鼓励百姓理直气壮地起诉一些官府的“规划等于空话”“宣传即是假传”，以“吹牛必纳税”的法治，促进各地官员“修辞立以诚”，戒假戒空，说实话，做实事，真正实事求是。

若温故“不干不湿原理”，则可明白，许多先进楷模变质，“朝为公仆暮成贼”——太原、茂名等地皆出现三任市委书记“前仆后继”当贪官，重庆、成都公安系统许多先进警官皆落马——只因民主法治之水太少。再好的“竹简”，也会因民主法治“不干不湿”而烂掉。发展中的许多困境，问题或许就出在“不干不湿”。（2014年10月16日《长江日报》朱健国）

◆评　论

美国制造业回归和中国的应对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似乎发生了“逆转”。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美元汇率的竞争力、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特别是，该报告通过对比美国在历次衰退前后的制造业状况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有在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制造业不仅得以较快恢复，还迅速地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作为最主要的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间增长47%，出口额一路刷新纪录。一般认为，促成美国制造业回暖主要有四个因素。

第一，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由于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市场变动等因素，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第二，随着近年来本国廉价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美国经历了所谓的能源繁荣，使其能源整体自给率有所提高，能源价格走低。特别是在页岩气革命推动下，美国天然气出口增加、进口下降，两者比率从2008年的24%跃升至2013年的55%。能源繁荣为美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能源成本优势和新的投资增长点。第三，在较长时间内推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所谓的“廉价美元”局面。这为美国制造业及相关出口带来了明显的价格优势。第四，长期以来，支持和推动制造业发展，是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实际上，这一提法充满争议，我们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美国的真正优势在服务业，所谓制造业回归很大程度上有造势之嫌。在国际分工急剧变动时期，我们更要冷静判断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趋势，正确估量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未来生产要素结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因素，我国应兼顾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聚焦中国的制造业部门，未来我国可以从研发创新和市场布局入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竞争力。在供给方，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建立有利于研发创新的制度环境，改进劳动力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协同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新环境下重塑“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在需求方，应调整制造业的市场布局，将更多力量用于开拓国内和周边市场。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对制成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由此持续扩大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制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此外，我国应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协同作战，防止被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谋篇布局，重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制造业回归只是这个大布局中的一个安排。近两年来，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等国际新规则，这一动向值得我们警惕。为防止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我国需要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两线作战。一方面，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提高中国制造水平，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酝酿和修订，扩大国内自贸区试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2014年第12期《求是》张晓晶 李成）

◆史海钩沉

分权制衡：北宋精致的顶层设计

北宋制度的精致程度是惊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分权制衡。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目的就是让除皇帝之外的任何个人、群体或机构都没有可能大权独揽，动摇赵氏江山。其实，就连皇帝也是在这“相维相制”里面的——纵然大权在握，基本上也做不到为所欲为，还是有东西可以约束他的。

为防范军人，采取“兵权宜分”的策略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军人、禁军高级将领。因此，宋朝建立之后，首要的防范对象就是军人。对于武装力量，宋朝采取“兵权宜分”的策略。如何分法？第一招，把全国各地地方军队中的精兵悉数搜罗到中央，编入禁军，在首都地区驻扎，让皇帝直接掌控的禁军成为宋朝国家唯一具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各地剩下的由地方政府直接管控的军队叫作厢军，人少、个儿矮、待遇差、基本无训练。其主要功能是卖苦力，比如修城墙、看仓库、运送物资等等。这样的军队是连小股土匪都挡不住的，就更别提抗衡中央了。第二招，禁军的最高司令部，从建国之初的两个变成了三个，最高军事将领的级别随之降低。那些曾经跟赵匡胤称兄道弟的老将们，早就被他一杯美酒释了兵权，回家享福去了。第三招，禁军的三个司令部只有管理军队的权力，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调动军队，必须要枢密院的兵符，而枢密院的长官从来都不是军人。用非军人来牵制军人。

然而，在宋朝最高统治者看来，上述分权措施，是有明显问题的。什么问题呢？经过整编之后的宋朝武装力量，有战斗力的禁军全部集中在首都，地方上没有能打仗的兵。地方上没有兵，如果在内地，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边境地区怎么办？要命的是宋朝的边防形势又是如此严峻——北有契丹大国虎视眈眈，西北党项桀骜跃跃欲试。地方上没有兵，边境怎么守？宋朝的解决方案是从中央派禁军来守——禁军以500人为单位、以半年到一年为通常期限，轮流守边，这种制度，叫作“更戍法”。这是分兵权的第四招。

此外还有第五招。领导那些被打散了编制又在边境重组的戍边军队的，基本上都不是军人。宋朝的军人和非军人之间的区别肉眼可辨——军人一旦入伍就要在脸上刺字，此字终身不去，此人终老不复是农人，士兵向上爬升可以当军官，得厚禄，但却始终被隔离在正常社会之外。被派去领导边防军的大部分官员脸上没字儿，我管他们叫“武选官”，这是一个夹在文官和军人之间的官僚群体，他们没当过兵，多半出身官僚家庭，念书不多但是识字、有基本的计算能力，平均文化水平不能跟正经文官比，但是肯定比军人高。能够被选拔到边防上来管理军队的武选官不少都有背景，大多是开国元勋的子孙后代。不过即便如此，他们在抵达边防岗位之前的主要履历可能只是管仓库，至多是个城市公安局长或者乡村治安巡逻队长。用武选官来管理军人，这就让“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之外，又多了一重“流水的官”。这种机制，分权很彻底，但就战斗力的养成而言，“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样的军队上战场，吃败仗一点儿都不奇怪。仁宗的时候范仲淹在西北整军，神宗和王安石改革军制，都是希望在军队和统兵官之间建立相对稳固的联系。可是谁也不敢或者不愿触动“兵权宜分”的红线。

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分割、互相制约、互不统属

从地方上来看，宋朝的地方政府比较固定的设置是州县两级。很有意思的是，州长的头衔不是刺史，而是知州，县长的头衔也可以叫作知县。知州是“知某州事”的省称，什么意思呢？以其他身份（通常是中央官）管理某州事。这种听起来很“临时”的头衔的确是新制度。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宋朝在新收复的土地上不再任命刺史，而是派其他官员来管理该州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之前的刺史多半是军人，以至于刺史头衔本身被赋予了军政一把抓的军人政治色彩。而宋朝政府绝不想让军人再度掌握地方，因此，他们要从中央派出文官去管理州政。文官知州，手里又没兵，当然不会形成割据隐患。知州还有一个新设的副手叫作“通判”。曾经有通判与知州闹矛盾时自称“监州”，说自己是皇帝派来监视知州的特派员。通判起初的确有这功能，后来天下太平，通判的监视功能退化，但是知州有什么重要文件，还需要跟通判联署，所以，通判对知州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制约。

宋朝建立之前，在州之上其实是有大行政区实际存在的，比如，一个节度使就管着好几个州。当然，也正是因为辖区广大，手里又有兵，节度使才最终走到了中央控制的对立面，成为分裂割据因素。宋朝建立之后，把节度使的辖区从几个州缩小到一个州（也就是节度使的驻地州），让节度使从雄踞一方的诸侯蜕变成区区一州之长，到后来，又干脆用文官知州取代了它。节度使没了，大区域的管理需求还是存在的。既要管理，又要防止割据，怎么办？宋朝的办法，是在州之上设置职责各异的多种大区域管理机构，每一种只负责一个方面的事情，转运使负责财政、上供物资转运，提点刑狱使负责司法监督复核，经略安抚使负责军队的管理，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分别向自己的中央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这些职能各异的大区管理机构，通常都负有监督区域内州县官员的责任，还是中央的耳目。

皇帝也受到各种制度传统的约束

受到分权制衡精神影响的不止是武装力量和政府，皇帝也在其中。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机构或者个人在制度上分割了皇帝的权力，而是说皇帝也受到各种制度传统的约束。首先，皇帝的宗族——天皇贵胄们被关在了政府外头，开国三兄弟的子子孙孙被国家用锦衣玉食养着，其主要作用是为皇位提供备胎——万一皇帝生不出儿子，还得用他们来保证赵宋江山的血统，但是，宗室不能参与政治。对于后宫和宦官，宋朝也都各有一套。实践证明，宋朝对于这些皇帝身边人的隔离管理是非常有效的。“本朝百年无内乱”是很多宋朝人引以自豪的政治成就。其次，宋朝的官员有着批评皇帝的制度、渠道和态度。论制度，宋朝有专以批评纠错为职责的御史台官和谏官，他们享有言论特权。论渠道，不同级别的官员可以通过面见皇帝、书面上疏等多种方式提出自己对国家大事、朝政缺失的看法。论态度，多数皇帝有大度包容之量，赵宋祖宗家法，“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尊重官员作为儒家学者的尊严。优秀官员有大忠爱国之义，在他们心中，是非法度比皇帝的好恶更重要，“人臣以公正为忠”“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所以，在宋朝，你会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个不大的官儿敢于义正词严地对皇帝说，“这是我的工作，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它，陛下不能侵犯我的职责”。

人事管理分门别类、互相牵制、各用其所长

宋朝政府的人事管理制度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它的特点同样是“分”。如果我们把军人之外服务于政府中的各种官员都算在一起的话，宋朝的官员其实有三种——文官、武选官还有宦官。文官的核心是科举出身的，进士出身的官员是其中最高素质的官僚群。武选官，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种不专业的统兵官。宋朝宦官的数量和行政事务参与度都比我们正常想象的大，而且，他们并不像明朝的宦官那样腐败，所以我把宦官也算成一种官员。这三种官员按素质排，是文官>武选官>宦官，按与皇帝的亲密程度排，则正好倒过来，宦官>武选官>文官。所以在很多机构，特别是经济管理机构里边，还有就是在军事行动当中，通常是这三类官员都有或者至少有两类，这样做的目的，是明摆着的——让他们互相牵制，各用其所长。

总的来说，北宋的制度，在方方面面都精巧地贯彻了分权制衡的精神。唐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五代军人跋扈的鲜活记忆，给北宋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宋朝制度在“防止出毛病”方面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上层无内乱，下层也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民众反抗。但是，在某些方面，比如军队的建设方面，就被捆住了手脚，损失了效率。分权制衡与效率兼得的制度，能不能做到，怎样做到？宋朝没有给出答案，只提供了个案，今人可以自行探寻。（2014年8月11日《北京日报》赵冬梅）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